

北宋新儒学先驱范仲淹的佛道情结

汪国林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 范仲淹是北宋杰出的儒学先驱,一生都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在北宋政治军事、思想教育诸方面都做出卓越贡献。但在儒释道思想融合的宋代,范仲淹的思想也印上释道色彩,再加上从小的佛教熏陶,方外人士的交游启发,自己对佛教的体认及其屡遭贬谪的经历都促使范仲淹对佛道思想的接受与认可,使其思想具有佛道情结。虽然这种接受与认可是站在理性的儒家立场上进行的,具有明显的实用性与功利性,但这也促进后世理学家援佛入儒,以道济儒以致形成新儒学的历程。

关键词: 儒学先驱;范仲淹;佛道思想

中图分类号: K8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7387(2011)02-0114-04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谥号文正,苏州吴县人。他是北宋有卓越建树的政治家、军事家,主持庆历新政,抗击西北边患,有“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1]之称,砥砺品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2]照耀千古,他兴办学校,奖掖后进,是杰出的儒学先驱,朱熹说:“文正公门下多延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徒,与公从游,昼夜肄业。”^[3]他指出“故文章之薄,则为君子之忧;风化其坏,则为来者之资”^[4],批评当时“修辞者不求大才,明经者不问大旨,师道既废,文风益浇,诏令虽繁,何以戒劝”^[5]的文风与士风,使其为之一变。

范仲淹一生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自称“臣闻生必尽忠,乃臣节之常守;没犹有恋,盖主恩之难忘”^[6]、“信圣人之书,师古人之行。上诚于君,下诚于民。”^[7]死后,也以儒学事功与砥砺品格受人尊敬,富弼说他:“遗奏不干私泽,此益见其始卒志于道,不为禄位出也。作文章尤以传道名世,不为空文。”^[8]欧阳修称他:“大通六经之旨,为文章论说必本于仁义。”^[9]王安石称赞他:“呜呼吾公,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10]元好问感叹道:“求之千百年之间,盖不一二见”^[11]《宋史》说他:“泛通六经……每

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12]纪昀评其为:“盖行求无愧于圣贤,学求有济于天下,古之所谓大儒者,有体有用,不过如此。”^[13]

儒释道思想融合已成定势的宋代,佛老思想已深入人心。宋太宗认为“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达者自悟渊微,愚者妄生诬谤。”^[14]欧阳修说:“佛能箝人情,而鼓以祸福,人之趣常众而炽。老氏独好言清静,远去灵仙,飞化之术,其事冥深不可质究。”^[15]范仲淹的思想、行为、心境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佛、道二教思想的影响。范仲淹也说:“康宁福已大,清静道自生。邈与神仙期,不犯宠辱惊。读《易》梦周公,大得天地情。……愿师先觉者,远迹濯我纓。”^[16]可窥其一斑。

范仲淹从小就受到佛教的熏陶;青少年时,曾在醴泉寺读书三年;知交富弼参华严修禅师;自己也曾参琅琊慧觉禅师,并与多位法师处士有过密切交往深有获益。另外,范仲淹仕途上屡起屡落,贬谪情怀诗作不少涉及佛道内容。笔者从这几个方面来探讨范仲淹的佛道思想,以期能更全面地了解范仲淹。

收稿日期:2011-01-15

作者简介:汪国林(1978-),男,安徽青阳人,讲师,四川大学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

一、范仲淹与僧人交游及其诗作中 流露的佛道思想

范仲淹与方外之人的交游广泛,如:释文光、广宣大师、真上人、越僧长吉、吴僧真、元二上人、金山寺识上人、希元上人、虎丘长老、四明僧湛公等。每到一处,也必敬游寺院,天平山白云寺、常熟顶山寺、越州翠峰院、睦州乌龙山寺、承天寺、虎丘云岩寺、苏州灵岩寺、杭州白塔寺、镇江甘露寺、南康军落星寺等都留下作者足迹。

明道二年,被贬睦州,与章岷推官同登承天寺,“僧阁倚寒竹,幽襟聊一开。清风曾未足,明月可重来。晚意烟垂草,秋姿露滴苔。佳宾何以伫,云瑟与霞杯。”^[17]游览乌龙山寺,“高岚指天近,远溜出山迟。万事不到处,白云无尽时。异花啼鸟乐,灵草隐人知。信是栖真地,林僧半雪眉。”^[18]与广宣大师交友密切,“忆昔同游紫阁云,别来三十二回春。白头相见双林下,犹是清朝未退人。”^[19]

移知苏州时,登灵岩寺,“古来兴废一愁人,白发僧归掩寺门。越相烟波空去雁,吴王宫阙半啼猿。”^[20]颇有点“万事皆空”的意味。景祐三年,范仲淹因上“百官图”被贬饶州,后知润州。作者远眺落星寺,亲临芝山寺,“楼殿观崔嵬,灵芝安在哉?云飞过江去,花落入城来。得食鸦朝聚,闻经虎夜回。偶临西阁望,五老夕阳开。”^[21]对佛教名寺充满敬畏之情。陪识上人游金山寺,“归心不可夺,千里故园春。及见市朝事,却思江海人。烟波方得伴,松月定为邻。愿结虎溪社,休休老此身。”^[22]表达对归隐山水的向往。高僧“笑我名未已,来问无端理。却指岭边云,斯焉赠君子”^[23]的教导使贬谪之情得以消解。

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出治邠州,后知杭州。在杭州,游白塔寺,“登临江上寺,迁客特依依。远水欲无际,孤舟曾未归。乱峰藏好处,幽鹭得闲飞。多少天真趣,遥心结翠微。”^[24]与僧长吉诗歌唱和,作《和僧长吉湖居五题》,特别是作《十六罗汉因果识见颂》,对佛教经典有深入的阐释。还与高僧日观大师交往甚密,对其人品佛学琴艺推崇备至,死后还为他勒铭纪念:“山月亭亭兮,师之心;

山泉泠泠兮,师之琴。真性存兮,孰为古今。聊志之兮,天竺之岑。”^[25]

此外,范仲淹还与僧文光有交往,“一品山前识,迢迢三十春。多惭画戟里,重见白云人。”^[26]对真上人的琴声也倍加欣赏,深爱升上人碧云轩的幽雅,“爱此诗家好,幽轩绝世纷。澄宵半床月,淡晓数峰云。远意经年就,微吟并舍闻。只应虚静处,所得自兰芬。”^[27]在郡斋中,也顿生禅退之心,“三出专城鬓似丝,斋中萧洒过禅师。近疏歌酒缘多病,不负青山赖有诗。半雨黄花秋赏健,一江明月夜归迟。世间荣辱何须道,塞上衰翁也自知。”^[28]

范仲淹有“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的一面,也有任运随缘、超脱逍遥的另一面,自己也说:“客爱往来何所得,僧言荣辱此间无。从今愈识逍遥旨,一听升沉造化炉。”以儒为主,兼济佛道,是范仲淹思想的鲜明特征。范仲淹感叹“上人之隐,盛于吾儒之隐远矣。”^[29]古寺名僧使范仲淹体会到快乐人生之外的逍遥与清静。

二、范仲淹与道士、处士交往及其 诗作中的佛道思想

范仲淹与道士来往唱和,如《访陕郊魏疏处士》:“贤哉先处士,天书召不起。云夫嗣孤风,复为隐君子。有石砺其齿,有泉洗其耳。不瞰红尘路,荣利无穷已。”^[30]皇祐元年,范仲淹知杭州,与处士唐异交往密切。范仲淹夸奖他“名动公卿四十秋”,还为其诗歌作序:“观乎处士之作也,子然弗伦,洗然无尘。意必以淳,语必以真。乐则歌之,忧则怀之,无虚美,无苟怨,隐居求志,多优游之咏;天下有道,无愤惋之作。骚雅之际,此无愧焉。览之者有以知诗道之艰,国风之正也。”^[31]发出由衷的称赞。

对“梅妻鹤子”的西湖名士林逋十分欣赏,“唐虞重逸人,束帛降何频。风俗因君厚,文章至老淳。……早晚功名外,孤云可得亲。”^[32]“片心高与月徘徊,岂为千锤下钓台。犹笑白云多事在,等闲为雨出山来。”^[33]曾多次寻访旧居,如《和沈书记同访林处士》^[34]、《与人约访林处士阻雨因寄》^[35]范仲淹还流露对隐逸的渴望:“萧索绕家云,清歌独隐沦。巢由不愿仕,尧舜岂遗人。一水无涯静,群峰满眼春。

何当伴闲逸,尝酒过诸邻。”^[36]范仲淹二十岁时,曾结识隐士王镐及周德宝、屈元应两位道士,直至庆历五年,范仲淹还替王镐写墓表:“周精于篆,屈深于《易》,且皆善琴。君尝戴小冠,衣白纻,跨白驴,相与嘯傲于鄠、杜之间,开樽鸣弦,或醉或歌,未尝有荣利之语。……岂如圭峰月下,倚高松,听长笛,忘天下万物之际乎!”^[37]可以想象他们友谊的深厚与王镐的飘逸神姿。

此外,范仲淹还有《赠茅山张道者》、《赠锺道士》、《道士程用之为余传神因题》等作。景祐四年,范仲淹在润州曾奉道五十余日,“丹阳太守意何如,先谒茅卿始下车。竭节事君三黜后,收心奉道五旬初。偶寻灵草逢芝圃,欲扣真关借玉书。不更从人问通塞,天教吏隐接山居。”范仲淹的隐逸情怀,随着年龄与处境的变化而日益浓烈。

三、范仲淹对佛学要义的阐释 ——以《十六罗汉因果识见颂序》为中心

庆历四年六月,范仲淹宣抚河东,曾发现佛经《因果识见颂》一卷,仔细审读并为之作序,这对范仲淹的思想有深刻的影响。

《十六罗汉因果识见颂》为“天竺沙门闍那多迦译”^[38],经首有对“因果识见”题解:“因者,因缘;果者,果报;识者,识自本心;见者,见其本性。若因缘故有善,果报有福,则自识其本心,见其本性,使万法不生,当得成佛。”^[39]范仲淹见之感叹道:“方知尘世之中有无边圣法,《大藏》之内有遗落宝文。”^[40]范仲淹遂命承天寺僧人归依别录珍藏,又为之作序,这一系列行为本身便表明他对佛经态度的严谨与真诚。他早在《上执政书》中就指出:“夫释道之书,以真常为性,以清净为宗。”^[41]表现出融通三教的宽广胸怀。

序文对其内容作了高度概括与称赞:“一尊七颂,总一百一十二颂,皆直指死生之源,深陈心性之法,开定慧真明之宗,除烦恼障毒之苦。济生戒杀,诱善祛邪。立渐法,序四等功德;说顿教,陈不二法门。分顿渐虽殊,合利钝无异。使群魔三恶,不起于心;万法诸缘,同皈于善。”盛赞其除恶从善的功能。为善之道范仲淹一生笃行,“泛爱乐善……

尝推其俸以食四方游士,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贍族人。”^[42]甚至认为善恶源自因果,他说:“或者曰‘儒生多薄命,天岂不为善也?’余谓不然:君子之为善也,必享其吉;有穷且夭者,世皆重而伤之,虽一二人,犹以为多焉。小人之为不善也,必罹其凶,其祸且死者,世皆忽而忘之,虽千百人若无焉。”^[43]佛教劝人为善与儒家的仁义思想有相通之处;“思天下匹夫匹妇有不被其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44]的爱民济世之心又与佛教入世救度的大乘精神不谋而合。范仲淹曾建议皇帝“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达彼群情。”^[45]将儒家的“仁”发挥到极点,到达“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无我”的境界,这受到佛教“同体大悲”、“无缘大慈”的影响。

正因为儒释有相通之处,该卷经书使范仲淹内心触动很大,以致“一句一叹,一颂一悟,以至卷终,胸意豁然,顿觉世缘大有所悟。倘非世尊以六通万行圆明惠鉴之圣,则无以至此。”产生强烈的共鸣。

四、范仲淹贬谪诗歌中的佛道思想

范仲淹正直敢言,一生屡遭贬谪。天圣七年,因上疏:“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46]被贬河中府通判。这对年轻进取的范仲淹影响不大,他说:“某天不赋智,昧于几微,而但信圣人之书,师古人之行,上诚于君,下诚于民。”^[47]即使向唐处士学琴,着眼点也是儒家大雅之道:“盖闻圣人之作琴也,鼓天地之和而和天下。琴之道,大乎哉!……崔公既没,琴不在于君乎?君将怜其意,授之一二,使得操尧舜之音,游羲黄之域,其赐也岂不大哉!”^[48]

明道二年再贬睦州。范仲淹虽说“圣明何以报,没齿愿无邪”,但也略觉不平:“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49]只好以“铜虎恩犹厚,鲈鱼味复佳”来消解内心的不满。“圣宋非强楚,清淮异汨罗。平生仗忠信,尽室任风波。舟楫颠危甚,蛟鼉出没多。”^[50]但对自己的满腹衷心换来的“尽室任风波”颇有点不满。“妻子屡牵

衣,出门投祸机。宁知白日照,犹得虎符归。”^[51]与“去国三千里,风波岂不赊。回思洞庭险,无限胜长沙”^[52]则流露出后悔之情,这导致范仲淹干世情怀的消减,吏隐与佛老思想渐增。在桐庐,范仲淹心境是“心共白云空”,过着“日日面青山”的吏隐生活,发出“谁复问千锺”感慨。“吾皇不让明皇美,可赐疏狂贺老无?”^[53]则明确表达归隐的愿望。

睦州任上,进取锐减,甚至焚香悟黄庭经起来,“千峰秀处白云骄,吏隐云边岂待招。数仞堂高谁富贵,一枝巢隐自逍遥。杯中好物闲宜进,林下幽人静可邀。莫道官清无岁计,满山芝朮长灵苗。”^[54]对隐士严子陵很是羡慕,“风尘日已远,郡枕子陵溪。始见神龟乐,优优尾在泥。”^[55]还高度称赞他:“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56]当然,这些心态的变化也是处境的暂时改变引起的,有些还是愤激之语,如说:“有病甘长废,无机苦直言。江山藏拙好,何敢望天阍。”^[57]范仲淹也以孟子自许,“轲意正迂阔,悠然轻万锺。”^[58]范仲淹在睦州很有政绩,“某罪有余责,尚叨一麾,敢不尽心,以求疾苦。”^[59]景祐元年六月,移知苏州。次年十月调回京师,领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

景祐三年三贬饶州,虽然范仲淹作《灵乌赋》,表达自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信念,但心中自是不满。“再贬鄱川信不才,子规相爱劝归来。”^[60]愤激之语,溢于言表。范仲淹也以“迂阔”自称,“此道果迂阔,陶陶吾醉乡。”^[61]移知润州,范仲淹竟收心奉道达数月之久:“竭节事君三黜后,收心奉道五旬初。偶寻灵草逢芝圃,欲扣真关借玉书。不更从人问通塞,天教吏隐接山居。”^[62]发出“功名若在天,何必心区区”^[63]的感叹。庆历新政失败后,外任邠州,后移知邓州、杭州。在杭州广交僧侣,佛学修养日深。皇祐三年,移青州。一年后,调任颍州,但只赶到徐州便溘然长逝,终年六十四岁。

范仲淹一生忧国忧民,历经坎坷,但终能从个人的恩怨荣辱中摆脱出来,以宁静淡泊之心面对各种境遇,这种平常之心与坦然之境是与佛道的影响分不开。但范仲淹并不崇佛,更不佞佛,以理性和实用的儒家立场来取舍佛道。对佛教的批评

也集中在蠹民之用,耗国之费上,并非从根本上否定佛道。在儒释道合一的时代背景下,他已开始自觉地释道教义中吸取营养提升自己的人格境界。虽然这种吸取具有明显的实用性,但也促进了后世理学家援佛入儒、以道济儒以致形成新儒学的历程。

参考文献:

- [1]厉鹗:《宋诗纪事》卷一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352页。
- [2][4][5][6][7][8][9][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40][41][43][45][47][48][49][50][51][52][53][54][55][56][57][58][60][61][62][63]范仲淹:《范仲淹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5、200、203、426、231、824、812、26、100、99、117、105、112、86、48、110、197、107、112、113、178、54、185、78、88、81、82、83、374、506、217、368、21、231、244、91、92、95、98、88、102、95、190、95、95、114、49、117、51页。
- [3]朱熹:《宋名臣言行录后集》卷十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0]王安石:《王安石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25页。
- [11]元好问,姚奠中校:《元好问全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797页。
- [12][42]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268、1027页。
- [13]永瑢:《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44页。
- [1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四,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54页。
- [15]欧阳修,李逸安校:《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67页。
- [38][39]《续藏经》第3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影印本,第834、834页。
- [44]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三,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77页。
- [4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零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970页。
- [59]董弁编:《严陵集》卷八,影印四库全书本。

(编校:龙凯)